

一个华沙青年的笔记

耶日·斯特凡·斯塔文斯基著



Ежи Стефан Ставинский
ЗАПИСКИ МОЛОДОГО
ВАРШАВЯНИНА

本书根据«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79№ 6, Москва版译出

一个华沙青年的笔记

【波兰】耶·斯·斯塔文斯基 著
侯华甫 何 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六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125 字数 172,000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6,000册

书号：10188·322 定价：(六)0.74元

出版说明

本书是波兰著名作家、电影剧作家、导演耶日·斯特凡·斯塔文斯基的作品(一九七七年)，荣获波兰文化艺术部一等奖。

作者毕业于华沙大学法律系，曾经参加过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曾被关进法西斯集中营。他在一九四九年就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主要作品有《黑暗中的曙光》、《卡特琳娜》、《为了追逐亚当》、《企鹅》、《最紧张的时刻》等，不少小说和剧本业已拍成电影。

本书以战争为中心，以一对华沙情侣——尤列克·比亚列茨基和捷列莎·索鲍列夫斯卡——为主人公，描述了从一九三九年九月德国突然进攻波兰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华沙起义这一段时期希特勒的血腥占领、波兰人民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英勇斗争，展现了一群年轻人不畏艰险、坚守战斗岗位以及他们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悲欢离合的生活图画。

作者让主人公尤列克·比亚列茨基用第一人称回忆了过去的四个生日的经历，并以此作为长短不一的四个章节。作者选择了一九三八、一九三九、一九四三和一九四四年四

个生日，从而概括了慕尼黑事件、希特勒进攻波兰、波兰人民英勇抵抗和华沙起义这样一些主要的历史事件。作者通过血淋淋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德国法西斯的惨无人道，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波兰的年轻一代是怎样生活过来的，热情地讴歌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在斗争生活和爱情生活中的高尚情操。

本书是根据苏联《外国文学》杂志一九七九年第六期俄文本译出的；前两章由何华同志翻译，后两章由侯华甫同志翻译。

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的十七岁生日

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五月份我拿到了中学毕业证书，根据不久前制定的法律，我应该很快去服一年兵役。这一天我是在扎科帕内度过的。父亲叫我去那里去，同他的第四个妻子见见面。在婚姻问题上，父亲显然走在这个时代的前面了——他不是按照他那个阶层所通常有的习惯那样，有一个合法的妻子和许多情妇，而是因为拥有时间和钱财，喜欢按照美国的方式生活，也就是说，有很多妻子而没有一个情妇。每一次离婚以后的重新结婚，都使他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当时没有别的办法。于是，他从天主教徒变成了新教徒，以后有一段时间他信奉东正教。和这第四个妻子的婚礼是在信奉伊斯兰教的维尔那举行的，因此，他现在只朝着麦加的方向做祈祷。

他竭力要使那些对他不太了解的人们相信，似乎他是在抛弃我们天主教国家的传统和偏见，想在一神教祭祀的各种形式中找到一种和至高无上的神进行交往的最完美的方式。但是我却知道得很清楚，这一切全不过是由于他那

些鬼婆娘的缘故。所以，我对父亲日趋衰老这一点甚至觉得很高兴。我是他第一次天主教婚姻的嫡生子，和当历史教师的母亲住在一起。我讨厌父亲的那些妻子。我怕成为同学们取笑的对象，我对大家隐瞒了关于他改变宗教信仰的事。幸而父亲从来没有到中学来过，而且尽管我是他唯一的一个孩子，一年中我一般也只能见到他几次。

我乘夜车到达扎科帕内以后，就直接前往私营的“奥里克”旅馆。父亲在这里为我租了一间相当昂贵的供给膳食及一切服务的房间，打算以此来祝贺我的生日，同时也算祝贺我领到了毕业证书和即将入伍，因为入伍通知书已经在我的口袋里了。早在五月份，我就和父亲一起查看过地图，研究了军事学校的位置，想在其中找到一所最过得去的离华沙又不太远的学校。当时在华沙只有一所下级军官卫生学校，而且那也是为培养未来的军医干部开办的。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一个医生，尤其是军医；我把服兵役看成是我的天职和特权，并为能够很快穿上军装而感到高兴，但是我认为这只能是我生活中一段短短的插曲。我也放弃了装甲部队下级军官学校，因为一想到坦克的铁盒子我就会恶心；有一些舱房常使我急性发作幽闭恐怖症。最后只剩下位于歇格热的通讯学校了，我就选择了它，因为这是技术工作，比较干净，而且不需要在田野里东奔西跑。总而言之，可以少参加一些严酷粗野的练兵活动，多听听课和实际接触现代化技术设备。父亲通过一位将军，他的一个主顾，把这件事办妥了，于是，我收到了批准我到我想去的那个地方报到

的书面通知。就这样，靠了父亲的托情，我能够象旅游者选择旅馆一样选择了兵种。

这天，只是到了傍晚，在“特沙斯基”饭店吃饭的时候，我才见到了父亲和他的第四个妻子。这次会面正值慕尼黑事件的前夜，父亲描述了德、捷边境上极端紧张的气氛。几天以前，他和年轻的妻子乘着自己的“克莱斯勒”刚刚通过这条边境。那是在他们从威尼斯——每次结婚旅行他都要带着自己的爱人到那里去——回来的路上。

“在德国一边，到处是满载着士兵的车队，那里尘土飞扬，天昏地暗；而在捷克一边，公路上布满了防坦克的鹿寨和铁丝网，使你不得不象绕过障碍滑雪赛线路上的小旗子一样绕过它们。我问过那个懒洋洋地检查我行李的海关职员：‘你们会屈服吗？’可他喊着说：‘我们将保卫自己！’但是我才不相信他哩，那里不会有一声枪响，当希特勒把他们一口吞掉的时候，他们连强一句嘴都来不及。”

“那个海关职员是一个很漂亮的大叔，”父亲的妻子雅捷娅补充说。年轻的雅捷娅比父亲小二十五岁，她还没有从她生活的变化中清醒过来，时而有点提心吊胆地望着父亲。她是一个管院子人的女儿。父亲在一次朋友们举行的宴会上见到了她。她是用五个兹罗提^①被雇来上酒菜的。她的美色使父亲为之倾倒，他差一点被虾汤噎住。而到告别的时候，父亲趁着她在衣帽间帮他穿衣服的机会，往她手里塞了一枚十个兹罗提的银币和一张名片，名片上的地址下

^① 波兰货币单位。——译者注

面写着：“请于星期四上午十时前来，我将对您提出一个有趣的建议。”

建议的确很有趣，所以他们当天就动身前往上等的疗养地尤拉塔。而姑娘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管院子人的家里。老头子和她在一起住了六个月，被她迷人的美色弄得神魂颠倒，决定信奉伊斯兰教，以便和他第三个妻子玛蕾西娅——一个任性的歇斯底里的女演员——离婚。如今我已经能够谅解父亲的许多弱点了。但是在当时，在我十七岁生日的那一天，我是怀着仇恨的心情望着雅捷娅的。父亲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但是并不设法讨好我。大概他觉得我的这种敌视态度是很自然的。因为在他看来，我心中似乎升起了妒火，而且不仅是对他，对她也是嫉妒的。

这个雅捷娅确实长得很漂亮，皮肤黝黑，身材匀称，还有两条长长的十分好看的腿。看来，她的母亲，一个虚胖的管院子女人，曾经被一个年轻的伯爵或者迷路的骠骑兵勾搭过。我的老头子望着雅捷娅，十分高兴，就象一个觅到了一匹良种马的马贩子那样。他让她穿戴豪华、时髦，甚至在意大利也是如此，因为尽管国内有限制外汇的规定，但他在国外总是有很多的钱。这也使我这个继承人很气愤。那天晚上，父亲似乎觉察到我已怒火中烧，便突然举起酒杯说：

“让我为你的未来干杯，尤列克。一年以后的这个时候，你就服满兵役了，那时，我送你去巴黎。你想到索尔蓬纳①

① 巴黎最古老的著名学府；自1852年起成为巴黎大学的一部分，现包括文学、理学两院及一系列研究所。——译者注

去读书吗？”

“当然想去罗！”我大声地回答。“可是我到那里去学什么呢？”

“法律或者哲学……”父亲建议说。“这由你自己决定！”

我不知道该选择什么才好。母亲曾想培养我对文学的爱好。最近她读普鲁斯特^①的书读得入了迷。普鲁斯特在不久前成了世界名人。他的书正先后被译成波兰文。她塞给我一本董布罗夫斯基的《黑夜与白天》以供路上消遣，但遗憾的是，我始终没能读完这部巨著。我不愿意和父亲谈论选择职业的问题，因为他和母亲的情趣截然不同，而且在任何问题上都是如此。诚然，父亲和他妻子们的那种轻松愉快的生活，经常往返的旅行以及任意挥霍金钱的气派，这一切都对我具有吸引力。可是，母亲的生活又怎能和他们相比呢？她总是埋头在练习簿里，安静得象只小老鼠，每天在收支簿上记着：“一只鸡蛋——五分钱”。我骄傲地干了杯。因为我能够当众喝酒，这就说明我是个大人，我已经十七岁了。

“在威尼斯听到什么消息吗？”我问雅捷娅，由于喝了酒，胆子也大了。“您当然是十分高兴罗？”

“简直好极了，”她回答说。“我差一点没掉进水里。”

四年前，老头子曾被一种莫明其妙的强烈父爱和对被他抛弃的儿子的负疚感情所驱使，把我带到了威尼斯的利

① 普鲁斯特(1871—1922)系法国作家。——译者注

多。我们三个人——我、他和女演员玛蕾西娅——一起在那里过了三个月。

这位玛蕾西娅当时三十多岁。她妄自尊大，常常心绪不佳，而且由于没完没了的梳妆打扮，不论上哪儿去总是迟到。她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位百无聊赖的上流社会的太太，似乎对什么都满不在乎。

有一次，我们从皮亚扎列-罗马乘汽艇沿着格兰德运河游览，我瞪大了眼睛望着哥特式宫殿上花边般的石雕，而父亲则面带笑容，注视着我惊奇的神色。这时，玛蕾西娅忽然一本正经地说：

“威尼斯果然名不虚传，不能不为之倾倒，但是我觉得这里的水本来就有些臭，现在比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更臭了。”

“那是因为爱情的玫瑰色彩云已经不象从前那样紧紧地笼罩着你了。”父亲突然触景生情，叹了一口气。但是他马上就给我丢了个眼色。

他们从到这里的第二天起就开始吵架了。当父亲往右拐弯时，玛蕾西娅总是要往左拐。她为了以后能在爱嫉妒的波兰女友面前卖弄自己黝黑的皮肤，常常一连几小时地在海滨浴场晒太阳，而且她在威尼斯除了去珠宝首饰商店以外，别的地方一概不愿去。父亲在我和玛蕾西娅之间感到左右为难，不知道是应该和玛蕾西娅呆在一起，也就是说，和她一起在弗洛里安咖啡馆一连几小时地喝酒呢，还是应该陪我去游览威尼斯、廷多列托和蒂齐安，而主要的是和

我一起乘游艇，这是我特别喜欢的。

当时父亲还爱着玛蕾西娅。在“达尔达涅雷”旅馆里，我常常隔着门听到隔壁房间里的动静。起初他们压低了嗓门吵嘴，然后就响起了床的吱扭声和低沉的叹息声。这使我很不愉快。我知道，我就象一根带刺的铁丝横在他们中间，我决心少惹父亲的麻烦，于是当他们在午饭后躺下休息的时候，我常常跑到旅馆外面去，就这样我熟悉了威尼斯。我乘游艇沿着格兰德运河到达车站，再从那里经过许多曲曲折折的小巷、小桥和小广场走到庞特-迪-里阿尔托，然后再到多扎宫。我每次都走不同的路线，逐渐扩大散步的范围。我常常站在小桥上久久地眺望河面，然后就到圣马可广场，在那里买几小袋豌豆喂鸽子（战前在华沙还没有象现在这么多会把城市弄脏的鸽子，当时它们只是在有名的凯尔泽利亚克市场上才有出售）。

多扎宫的圆柱上张贴着许多宣传画，上面都是墨索里尼的画像，他头戴钢盔，钢盔带紧紧地扣着沉重的下巴。画上写着：“V il Duce！”^①有一次，正当我仔细地看画那个人（他应当恢复意大利人的民族尊严）的气势汹汹的嘴脸和他旁边那些直挺挺站着的宪兵（他们头戴滚红镶金三角帽、身穿早在百年前就时行过的老式制服）的时候，在皮亚泽泰出现了一队黑衫队员。他们随着有节奏的刺耳哨音列队行进，但是哨音也没有什么用处：队伍象是公路上的一群鹅，走得歪歪扭扭，每个人都自管自地走着。在威尼

^① 领袖万岁！（意大利语）——原注

斯的阳光照耀下，在耀眼的浅红色的多扎宫这一背景的衬托下，这些法西斯看上去就象是某些奇形怪状的小丑，而画着领袖像的宣传画则象贴在稍远处普通墙上的那些预告歌剧“乡村的荣誉”上演的短命海报那样，把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座哥特式建筑物弄得丑陋不堪。“Il Duce ha sempre ragione!”^①——每当玛蕾西娅反驳我父亲的时候，我就当着她的面大声说这句话。玛蕾西娅从骨子里恨透了我。

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去看歌剧“乡村的荣誉”。这天晚上，我们之间出现了沉默的休战。玛蕾西娅穿着红色的绸连衫裙。这是她专为看歌剧而买的。父亲穿着浅咖啡色夏装，戴着一顶白帽子，很象一个富有的巴西种植场主。我穿着一条短裤，这个季节一过，我就再也没有穿过这条短裤了。

三个人这样盛装外出，使玛蕾西娅很恼火：可不得了啦，准会有人以为我是她的儿子！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但她决心要永远保持妙龄女郎的样子，无论什么都不能动摇她的决心。这位少奶奶身体结实，皮肤白里透红，喜欢炫耀自己的身材，而且不顾时兴，衣服紧包着屁股。据说，似乎她是为了父亲才放弃演戏的，为此曾不止一次地埋怨过他。有一次，父亲也忍不住了，就直截了当地跟她摊了牌：她除了“吃现成饭”以外什么戏也没有演过，为了让她扮演一个体面的角色，他得给剧院一笔数目可观的款子，但他没有这么多钱。这一切我通常都是隔着门听到的，这样我就成了这

^① 领袖永远有理！（意大利语）——原注

两个彼此并不相配的人的关系破裂的见证人。而且，我和他们在一起也许更加促成了他们的离异。应当承认，我当时已经决定加速这一不可避免的过程，帮助那个四十五岁的糊涂人摆脱这种瘟疫。那天晚上，我们从利多乘船去看歌剧“乡村的荣誉”。我象往常一样，在游艇的甲板上跑来跑去，但不时地瞥一眼坐着的一对盛装男女：父亲和玛蕾西娅。我很快发觉，玛蕾西娅和一个戴着护从领章的漂亮的黑发意大利人眉来眼去。父亲背朝意大利人坐着，根本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事，但是我却气得浑身发抖：她竟然如此轻佻放荡！她当然不能指望和这个陌生的黑发男子做出什么风流韵事，因此她那种俗不可耐的卖俏行径只不过是矫揉造作罢了。看得出来，淫佚放荡是她的本性。

我向她跑去，装出一种调皮的神情，用娇生惯养的孩子声调，大声地请求她说：

“妈妈，给我买一枚象这位先生一样的徽章！”我手指指着那个情欲炽烈的法西斯分子。

那个人马上转过身去，而玛蕾西娅仿佛挨了一鞭子似的，脸象小姑娘一样地发红了。我对玛蕾西娅那种不平常的亲昵态度使父亲感到惊奇，他先嘲讽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看了看意大利人。

“你也想做个法西斯？”他问道。

“我希望象这位先生一样漂亮，”我回答说，“好让所有的太太都出神地看着我。”

我的老头子似乎有点儿开窍了，因为他立刻看了看脸

一直红到耳根的玛蕾西娅。在一种可怕的沉默中，我们一直走到圣马可广场。玛蕾西娅走在最前面，父亲离她有半步远，我走在最后面。我对自己玩的把戏挺满意。现在一场风波已经不可避免，而且随时都可能爆发，因为玛蕾西娅气得快疯了。

举世闻名的露天剧场被普罗古拉齐拱廊上的和高挂在露天舞台前大乐池上空的灯火照得通明。在广场的大理石地板上摆着一排排椅子，大部分椅子上已经坐着观众。我们就因为玛蕾西娅的梳妆打扮，直至开演前的最后一分钟才到达剧场。头几排坐着满身珠光宝气的太太和女士们。我们的座位离舞台非常远，在最后第二排或者第三排，这使玛蕾西娅又歇斯底里大发作了。

“怎么，”她喊了起来，“让我坐这么远？！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坐到第三排以后过！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来了！这里什么也看不清楚！这就是你说的‘好位子’？”

父亲低声给她解释，这是一次隆重的有历史意义的演出，能来观看这次演出就很荣幸了，头几排票子早已包给“爱克斯泽尔西奥尔”旅馆里的百万富翁和亲王们了……但这样的解释无济于事，这位大发雷霆的太太东碰西撞地擦过坐着的观众，开始从两排椅子的空隙中向出口挤去——现在连我也明白了，她完全是一个在边远省份的穷乡僻壤长大的人。这时刚好乐队指挥登上指挥台。他就是音乐大师马斯坎伊本人，“乡村的荣誉”的年近七十的作者。他到这里来是为了给自己的歌剧当指挥，并重新感受一下他在

四十六年前获得过的胜利的喜悦。作者的出现使我们的邻座们不再去注意狂怒的玛蕾西娅，而她终于费力地挤到了过道上，并朝着多扎宫奔去。父亲气得涨红了脸，但遗憾的是，他还不忍一刀两断，于是跟在她后面追了上去。结果剩下我一个人难受地挨过了整整一场戏，因为我不好意思再去惊动别人了。幸好歌剧只演了一个小时左右。掌声经久不息，可我却趁着大家站着鼓掌的机会，钻到了圆柱外面，解了个手，就跑去寻找吵架的一对了。

直到过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真正懂得在世界上最著名的广场中心的这场精彩演出的价值。这个场面非常清晰地铭刻在一个少年的记忆中，以至后来我都能在想象中欣赏这个场面，如同欣赏一张从相片簿中抽出来的旧照片一样。特别是在痛苦和恐怖的年代，我常常回忆起：温暖的浅红色的被灯火照得通明的威尼斯，广场上的演出，音乐大师马斯坎伊指挥的序曲……也许，以往的这一切都是梦幻，但是谁也不能把它从我心里夺走了。靠了它，我才比较容易地度过了痛苦的岁月。二十五年以后的一天晚上，当我难以置信自己的幸福，竟然重新踏上圣马可广场的石板地面的时候，我看到的已经是某种别的东西了，尽管一切仍在原处：那大教堂门廊顶上的马群像，那钟楼上举着锤子的摩尔人像，那普罗古拉齐拱廊下的珠宝商店。这一切都在原来的地方，但是和我内心珍藏着的清晰的画面相比，这一切就显得过于真实了。

我毫不费力地在皮亚泽泰，在多扎宫对面咖啡馆的桌

子旁边找到了他们。他们已经吵过架了，两人都气鼓鼓地坐在那里，父亲喝着果子水，而她喝着鸡尾酒（据说她在剧团里就学会了喝酒，所以她现在每天都要消消停停地喝一些烈性饮料）。他们默默地生着气。

“你喜欢吗？”父亲问我。

他说这话的语气很平静，看上去已经心平气和了，但是我知道，他恨不得立刻就掐死玛蕾西娅。她是属于被爱人宠坏了的那一类女人。她相信已经完全掌握了男人，一点都不想克制自己的任性，使举止不超出可以容忍的范围。此外，她变得不拘礼节、肆无忌惮了。玛蕾西娅显然认为，她那包屁股的样子能够激起男人的性欲，同时自然也就使他失去任何自主权和自尊感。因此她恣意践踏他的自尊心，不让他的性格有任何表现的机会，总之，她把他变成一个窝囊废，似乎这样就能显示出自己的威风。那天晚上我凭某种特殊的嗅觉看出，这一次玛蕾西娅搞得太过火了，父亲身上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现在我可以这样说：口角、大闹和冲突已经由量变转化为质变，玛蕾西娅的魔力失灵了。但在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什么辩证法，只是感觉到一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快要发生：在我父亲的精神生活中，信奉东正教的阶段即将告終了。

“我非常喜欢！”我愉快地回答说。“这个马斯坎伊老头精力充沛地挥舞着自己的指挥棒，而歌剧演员又都是第一流的！要是我把这一切都告诉母亲，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她是那样地喜爱音乐……也许，为了今天能来观看这个歌

剧，她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哪怕坐在最后一排也行！”

玛蕾西娅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她跳起来，哼了一声就向码头奔去。父亲再也忍不住了。他很快地付清了帐，然后我们跟着她离开了咖啡馆。在回旅馆的路上，大家都默不作声。即使到了房间里，我也没有听到门那边有什么吵架声或叹息声——可以说没有任何响声。显然，老头子决定表现自己的个性了。他终于为这一切付出了代价。早上，父亲干巴巴地通知我，我们回去的日期比原定的提前了。第二天，天色阴沉，还下着雨，我们坐着“克莱斯勒”动身回波兰了。

玛蕾西娅被父亲的沉默吓坏了，就立刻改变策略：一路上她象关心自己宠爱的孩子那样关心他。由于害怕失去报酬优厚的位置，她在他开车的时候，给他递夹肉面包，点香烟，总之，她变得安静、顺从、忧郁和体贴了。但是老头子不让自己再上当受骗，这使我更加喜欢他了。父亲对她所有的殷勤和体贴都报以有礼貌的微笑，或者说几句感谢的话，但是连她的手指都不碰一下。我在玛蕾西娅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毫无生气的恐惧的神色，因为如果他要抛弃她，那她再也找不到这样好的位置了；逝去的岁月已经开始微微地损坏了她的皮肤，尤其是脖子。当我们在路上稍作停歇的时候，父亲带了我一起走开，留下玛蕾西娅一个人去进行痛苦的思索。到了华沙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见她了。学校开始上课，我对于威尼斯的记忆逐渐淡薄了。只是过了两个月以后，我才知道我父亲又成了单身汉，而玛蕾西娅拿到了一笔赔偿金以后，就跟上了一个前途没有把握的萨克